

首先一點更正。我沒想到Brian Wilson高估了我的能力（見204期14頁）。MBOU的名銜不過代表我是世界一流鳥類學組織「英國鳥類學家協會」的會員。誰都可以參加，取得會籍的方法是找一位會員推薦入會，並寄上年費支票。會員福利主要是收到季刊「Ibis」。這份刊物對我來說有點艱深，或許書評專欄較為有趣味。香港觀鳥會圖書館內應該還有一些舊「Ibis」的季刊。至於我和Fred Hechtel確實需要通過一個非正規測驗後才獲取的資格是「鳥類環誌執照」，至於詳情我再已想不起來了，不過肯定要有有經驗的環誌工作者確認我們能勝任鳥類環誌工作才可。

我第一次到米埔的日期是1965年5月30日，收獲是勺嘴鷸。我一、兩年前在新加坡已見過，不算新記錄，但Fred Hechtel十分高興；那時我還未加入鳥會，但他邀請我接手Maura Benham作為觀鳥會記錄主任的工作。當時的鳥會很細小，會員只有三、四十人，而活躍的鳥友只得數名。一點也沒有誇大，海軍指揮官Edgar Webb既是主席又兼司庫，更是通訊編輯和觀鳥活動的召集人，還有其他……總而言之「一腳踢」。（我手邊沒有任何文件或筆記，本文全靠腦海的回憶，除了第一個日期之外，其他的日期不保證絕對準確。）

在1960代中期，我們大部份都是「單純的觀鳥者」，Edgar Webb喜歡這樣形容他自己。我們努力觀鳥，增加鳥種。許多現今每年都有記錄的鳥種當時相對罕有並首次在香港錄得。我仍記得香港的第一隻半蹼鷸、長嘴半蹼鷸以及小青腳鷸；還有首隻黃腹山雀和黑領噪鵲及其他數種。分辨鳥種經常有疑難。在大埔滘分辨黃腹山雀時，我特意帶去了La Touche著的《中國東部鳥類手冊》，坐下逐字細看，逐條羽毛仔細比較。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爆發，我們不清楚香港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只理解港英政府正全神貫注地與這個巨大的鄰居交往。保育並沒有被忘記，但重要性當然不能與今時今日相比。在1968年Fred Hechtel為政府一個委員會編寫了第一份關於米埔濕地的詳細報告。就在這個早期的日子，Fred、Dave Robertson和我，還有鳥會幾位委員已領悟到，要保存米埔，必定要有大量的香港華人參與，以及讓米埔發揮教育之用途。Clive Briffett滿腔熱情的向著這個構思發展，開始了數個以學校為目標的計劃，可惜，記憶所及他在香港的時間不長。首先為香港鳥類配上中文名稱的是Lawrence Tam，他跟我討論後用在1972年出版的香

港鳥類名單內，大部份中文鳥名沿用至今（除非林超英在翻譯尹璉的鳥類圖鑑時把鳥名修改了）註1。

應南華早報邀請，約有四年的時間，我每週寫一篇有關鳥類的文章。同一時期，我是長春社的執行秘書，我不會錯失任何在報章和播音電台宣傳米埔及推動環境保護的機會，這令我在外籍人士社會裏出了名（又或是令人討厭），但在華人社會裏我籍籍無名。

我亦為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講授一系列觀鳥課程，引來了第一批香港華人觀鳥者，其中包括林超英。錦繡花園計劃把一大片優秀的育鳥濕地（水雉在那裏繁殖），從米埔切割出來。後見之明，這次破壞其實也隱藏了祝福，使我們可作強而有力的抗議，以及獲得更廣大公眾的注意。這時，John Chapple榮升為英國駐港三軍總司令，在他的協助下，把推動保育濕地活動，帶到政府的最更高層次去。漁農處的梅偉義也盡他最大努力去協助。

在1970年後期，我變得沒有那麼活躍，把米埔發展成為教育項目的工作，在梅偉義及尹璉的督導下由世界自然基金會推行。香港華人觀鳥者的人數漸漸增加，主要歸功於林超英、張培基及長春社的努力。

與這些發展同時，彩色鳥類圖鑑陸續出版，稍後鳥類環誌活動展開，鳥種的辨別愈趨科學化。我初期的香港鳥類名單經Mike Chalmers修訂成了1984年的版本，近期賈知行及其他作者的香港鳥類名錄，再作了更廣泛的修訂。

現在的香港觀鳥會，令人刮目相看。許多在過去十五、二十年新加入香港名單的鳥種，相信我也認不出來！有趣的是在最近的年報裏，環誌數據及相片比重增加。一個有生命力的鳥會會繼續改變，這是必要的，五十年後的鳥會將與現在的有很大的分別。此乃理所當然。

定期的鳥會年報及通訊顯示，米埔濕地所錄得的鳥種和數量都遠遠比1960及1970年代多，這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管理核心區努力所得，還有可能是中國內地生境受破壞所導致的，在在顯示現今米埔的地位，比1960年代後期及1970年代初期我們剛開始為保育米埔而奮鬥時更為重要。

註1：Lawrence Tam和林超英同樣主要跟隨鄭作新教授的中文鳥名，變更不太多。